红色收藏

# 解放太原中的静乐人

杨秀川

“人民功臣”木匾（作者供图）

1949年3月，静乐籍战士秦海田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冲锋陷阵，荣立甲等功。当时晋绥野战军七纵队十二旅旅长张新华、政委龙福才签发嘉奖喜报寄回他家。静乐县人民政府在县城召开大会予以庆贺，同时授予“人民功臣”大红木质牌匾一块。

这块“人民功臣”牌匾长156厘米，高66厘米，厚3.3厘米。中间四个黑色大字从右到左为“人民功臣”，两旁各有两竖行小字。右两行为：“恭贺/秦先生令郎海田。”左两行为：“静乐县城关全体群众敬赠/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廿日”，字体为楷体阳刻，由邑人张泽民书写。

如今，这块“人民功臣”牌匾由秦海田的弟弟秦兴田珍藏。

在解放太原战役中，除了秦海田这样英勇奋战的普通战士外，还有大量默默无闻的民兵和群众，组成支前队伍，为解放太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静乐县动员了大批的民夫，筹集许多牲畜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队伍。部队在前面，担架队、运粮队紧随其后，在太原战役中，汾河川时时可见运粮、运草、运弹药、运木料的前进队伍，还有抬着伤员转运到后方救治的担架队队伍。1947年冬，静乐县动用大批人力、物力往返忻州前线转运粮食10900石，以及军火和军用物资。同时，经过土改得到土地的农民响应县委号召，自愿组成“翻身队”主动支前，40天内完成400石粮食的筹集任务。

1948年9月17日，静乐县支前总指挥部成立，县武委会主任李容任总指挥，副县长阎树德任副总指挥，县委书记王敖任政委。指挥部下设军勤股、财粮股、担架股。各区亦成立与此相应的机构。9月，为晋绥军区二旅组织毛驴90头，用工360个，运送山药蛋；组织毛驴900头，投工3600个，运送炭和部队军用物资。同年秋，支前指挥部动员1500多人、大牲畜310头，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在三分区运送粮草、弹药和伤员。10月下旬，成立2000人的静乐支前团开赴太原前线，李容任团长，下辖6个营，各区民兵大队长分别担任各营营长。这支参战部队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才返回静乐。

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起至1949年4月24日结束，历时6个月20天，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城市攻坚战。在此期间，据不完全统计，静乐县仅在太原西山风格梁与牛驼寨牺牲的烈士就有100多名，参战人数1500多人。仅1948年，静乐县就动用毛驴2538头，投工20042个，为前方转送弹药、粮草、被服、军鞋。静乐妇女在支前中功不可没。她们在后方变工耕种、收割、碾米、磨面、做军鞋，有的妇女一年要做好几双，还要操持家务。甚至出现了许多送夫、送子去参军、参战的感人画面，当时支前的声势十分浩大。

据参加过解放太原的一位老兵回忆，他们进攻太原城时，城墙上阎锡山的守军还在负隅顽抗。这支守军中大多是静乐人，他们看到解放军中有许多熟悉的静乐老乡。其中一个大个子营长把手一挥，大声吼道：“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了。”于是，城墙上的几十名静乐人全都放下武器。不久，投诚到解放军的部队中来，为解放太原荣立大功。

# 都沟土鼓

梁妍颖

太原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只出土于都沟遗址第三期的土鼓。该鼓上部为泥质，下部为夹细砂的灰色陶。方唇，平沿，敛口，上部为筒形，用泥条盘筑套接法逐渐加长而成，约长0.96米，唇部有6个泥柄状装饰；下部为鼓腹罐形，腹部有6个镂孔，底部应有一个较大的镂孔。土鼓表面装饰有较粗、较杂乱的断组纹。上部的管筒由三节连接而成，连接处附加两圈泥条加固，其表面可看到大量的指甲纹，疑是匠人在按压泥条时留下的。这只土鼓的形制类似陶寺文化早期的土鼓，或许与其有渊源。

都沟遗址位于太原市清徐县马峪乡，涵盖了庙底沟文化晚期到龙山时代早期比较完整连贯的文化发展系列。该遗址的第一期应该是本地庙底沟文化的延续；第二期彩陶尤为发达；第三期陶器组合较复杂，文化面貌趋于多样化，除了宽肩壶、折肩壶之外，还出现了器盖、豆、土鼓等新器形。特别是土鼓类陶器，此类器物在完成后还在表面绘有红色彩画，它的出现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都沟遗址与陶寺文化早期有许多共性。第一，陶寺早期有大口折沿罐、筒腹侈沿罐、敞口盆、矮把豆、碗、钵、土鼓等，未见扁壶、彩绘龙盘、泥质单耳罐等，出现了小罐、单耳杯等新器类。它们之间在器类上存在很多共性。第二，陶寺早期的土鼓分为两型，制作精美；都沟遗址中出土的土鼓原始，不分型，较单一。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是较明确的，都沟的土鼓应是其重要的源头。第三，都沟遗址第三期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陶寺早期是无法比拟的，尤其是陶寺大墓所反映的氏族内部的财产、权力的分化，在都沟遗址第三期未见到。通过以上三点可以合理判断：都沟遗址的族属在陶寺文化早期之前，由于某种原因南迁至临汾盆地，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土鼓的发掘具有重大意义，体现了远古时期人类的礼仪文化。土鼓自发明伊始便承担着沟通神人的作用，在陶寺遗址墓葬中，土鼓、鼍鼓都是相伴共存的。由此可以证明，它们是原始社会中重要的礼乐器之一。

“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史前时期，发明鼓的目的、鼓的用途虽无文献明确记载，但可以通过出土地点和一些后世文献的追溯来合理推测。首先，陶鼓是一种乐器，用来演奏。其次，鼓也是一种祭祀器物，是可以通灵的一种“神器”，如山东野店遗址发现的陶鼓多集中于墓葬中，表明陶鼓实为少数人所享有的特殊用品，这些墓主人的身份比较特殊，随葬品也较为丰富，显然属于部落酋长或巫师一类人群。结合民族学材料来看，今天广西壮族师公在主持求雨、除虫、祛邪、超度、消灾祈福等活动中仍击鼓歌舞，可谓是古代用鼓通灵驱邪的孑遗。

今人往往认为，“鼓”只有一个敲击的声音，因此演奏方式简单——只有敲击一种方式，这种看法比较狭隘。从文献追溯和民族学资料综合来看，可以推断，新石器时期的陶鼓有多种特殊的演奏方式。根据实验室复原模拟来看，陶鼓有不同的音节，敲击鼓面中心和鼓面周边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主要是因为鼓膜震动频率不同导致的。《诗经·灵台》：“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形容鼓声“逢逢”（鼍鼓也是一种陶鼓），此外还有形容鼓声“其声英英”“其声隆隆”等拟声词，说明敲击鼓的不同部位，可以产生不同的音节。

土鼓传承千年，是先人们在极其原始简陋的环境下创造出的乐器，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岁月的打磨之后，依旧在民族乐器宝库中闪闪发光。土鼓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种乐器，里面杂糅了先民们波澜壮阔的神话想象、唯美动人的情爱故事、一代代的坚守与传承，让其延绵至今。当土鼓的鼓面被敲击的时候，仿佛千年之前的鼓声撕裂了时空，古老而又神秘的祭祀音乐重新又回荡在了听者的耳边。

出土于清徐都沟遗址第三期的土鼓（太原市博物馆藏）

土鼓的节奏感让我们感受到了先人们的乐律节奏之美。“砰砰砰”的敲击声虽然简单而单调，但是其中蕴含着其他乐器所不具备的狂放野性之美，简单直接，却直击人心。

清代《汉书下酒图》（山西博物院藏）

# 汉书下酒 酣畅淋漓

钧 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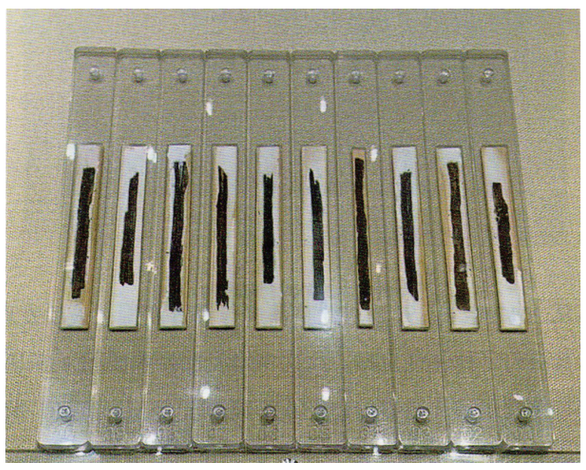
由山西博物院收藏的清代董文涣《汉书下酒图》是一幅纸本画作，纵28.7厘米，横57.5厘米。该作由已故山西籍国画大师董寿平在20世纪60年代捐献。董文涣为董寿平祖父，董氏家族是清末的盐商及官宦大族，家族藏品丰富。

《汉书下酒图》创作于19世纪中叶。该画以“汉书下酒”为主题，展现了古人读书品酒的雅致生活。画面布局上，董文涣采用了散点透视这一典型的中国画构图方式。远山不见高山叠嶂、嶙峋怪石，而是峰峦晦明、林靡烟云。近景树木茂密，河水潺潺，一人独坐于树木间的草屋之内读书，手边案上置一壶酒与几摞书，怡然自得。该画远山和近景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具有典型的文人画特点。以书法入画，线条流畅而富有节奏感；构图简洁大方，又不失精巧细腻；色彩淡雅而富有韵味。

董文涣（1833～1877），字尧章，号砚樵，山西洪洞人，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著名诗人和诗律学家，曾在咸丰年间中进士，一生著述颇丰。

“汉书下酒”典故出自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其所记为宋代名士苏舜钦嗜酒，寄居岳丈杜衍家，夜读时每需饮一斗，亦不需下酒菜肴。杜衍遣人暗中伺察，当晚苏舜钦读《汉书》，读至张良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时，拍案叹惜道：“惜哉，此击之不中也！”言讫，满饮一大杯。继读至张良投奔刘邦，言“此天以臣授陛下”一节时，舜钦又拍案叹道：“噫，君臣相遇，何其难也！”说罢，又满饮一大杯。杜衍闻后大笑道：“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诚不为多也！”

以书佐饮，既是古人饮酒读书的风雅表现，也是古人嗜书如命的真实反映。苏舜钦以书佐饮，为后人传为佳话，对后世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陆游也曾以书佐饮，他在《雁翅夹口小酌》一诗中写道：“欢言酌清醥，侑以案上书。虽云泊江渚，何异归林庐。”清代文人屈大均《吊雪庵和尚》一诗中亦有“一叶《离骚》酒一杯”之句。



汉代木简（太原市博物馆藏）

# 『简牍』晋阳

段惠子

在太原市博物馆展柜中陈列的木简，材质为云杉，残简上依稀可辨认的字有：“□其□□□中□其□百日”“□□□二寸□”等，是太原东山悦龙台汉墓出土各类文物66件（组）中较为重要的发现，填补了山西考古在该方面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

木简即牍，古代用以书写文字的狭长木片，引自《南史·齐本纪上第四·高帝》：“井中得一木简，长一尺，广二分，上有隐起字。”《汉书·高帝纪下》中记载：“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唐朝的颜师古也有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

追溯木简的发展历史，图书——作为人类记载和延续文明的一种方式，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纸发明之前，我们的祖先除了把文字记录在甲骨、金石上之外，使用最为广泛、时间最长的便是竹和木，而经过加工后写了字的竹和木就称为“简牍”。虽然我们常说“简牍”，但其实“简”和“牍”是不同的概念。简，由竹或木加工而成，通常是削成长条形，再将写字的一面打磨光滑；如果是竹质的，还要用火将竹子烤干防蛀，“杀”去竹青，烤出“汗”珠，故称“杀青”或“汗青”。而牍多为木质，与简不同之处是加宽了好几倍，大多宽约6厘米，个别可达15厘米以上，呈长方形，故又叫作“方”或“版”。牍多用来书写契约、医方、历谱、过所（通行证）、书信等。较长的文章或书所用的竹简较多，须按顺序编号、排齐，然后用绳子、丝线或牛皮条编串起来，叫作“策”或“册”。

虽然我们现在发现最早的简牍实物是战国时期的，但保守估计，以简牍为主要文字载体的时间可达3000年以上。与简牍同时并用的还有帛书，但由于它比较昂贵，通常只能用于抄录重要的书籍和文件，不能像简牍一样被广泛使用。

与简牍相关最为经典的一个典故是“韦编三绝”。相传孔子到了晚年，喜欢读《周易》。当时没有纸，字是写在一片片竹简上，一部书要用许多竹简，必须用熟牛皮（韦）绳子把这些竹简编连在一起才能阅读。平时卷起来放着，看时就打开来。《周易》文字艰涩、内容隐晦，孔子就翻来覆去地读，时间久了，把编连竹简的牛皮绳子磨断了许多次。即使读到了这样的地步，孔子还是不满意，说：“如果我能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多理解些《周易》的文字和内容了。”后来，“韦编三绝”用来形容读书刻苦勤奋。

商代弓形青铜器（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 神秘的弓形青铜器

如 黛

在山西青铜博物馆中有两件神秘的商代晚期弓形青铜器，出土于山西灵石县旌介遗址1号墓。

这两件弓形器中部为扁平的椭圆形长弧，微微向上拱起，饰有八角星纹，两件弓形器上的八角星造型有所不同。两端是弧形臂，弯凸近半圆，两侧末端各有一个圆球。

弓形青铜器的神秘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它的造型很特别。其长度一般在20至50厘米之间，山西青铜博物馆馆藏的这两件弓形器较大，均超过了50厘米。二是它的分布范围很广。中国北方、俄罗斯的南西伯利亚地区以及蒙古国的广大地区都有出土。中国北方发现的弓形器从商朝晚期开始到西周中期，之后就消失了。三是它的用途不明。宋代宣和《博古图》认为它是一种铃铛，还有的认为它是一种装饰物。这两种早期的观点已基本被否认。

目前学界较为认可的观点有三种。一是弓的附件说。这种说法认为弓形器是弓的一个附件，绑缚在弓的中段，一方面增加弓的弹性，另一方面，当拉弓拉到一定的强度，两端的圆球就会振动发声，提示可以放弓弦了。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在于，有的弓形器残留朽木，且与箭镞同出。不过弓形器能否增加弹性不好说，但必然会增加重量，也不利于拉弓。第二种说法认为，这是一件“安全钩”。其用法是绑在驾车者腰带上，把人与马车其他坚固部位钩挂绑缚在一起，以克服马车行进时产生的震荡。其原理就像现在汽车、飞机上使用的安全带一样。这一说法的提出，是因为有研究者发现有一车多器的现象。他们认为这种现象暗示了弓形器不专属于驭者。第三种说法认为，这是一件“挂缰钩”，也是目前最被广泛认可的一种说法。该说法认为弓形器属于车马器的一种。驭者将弓形器绑在腰带上，需要时把缰绳挽挂在钩上，这样驭者的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可以拿起武器战斗。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弓形器多出土于车马坑的车厢里和墓主人的腹部，这似乎暗示了弓形器与马车以及人体腹部有着密切的位置关系。